

山东财政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出版

儒士与两汉政治形态研究

刘中建著

ZHUANZHI
WANGQUAN
DE
YIFUXING
HEZUOZHE

河北大学出版社



山东财政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出版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儒士与两汉政治形态研究

刘中建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刘中建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1097-420-2

I.专… II.刘… III.儒家—知识分子—关系—君主制—中国—两汉时代(前202~220) IV.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934号

责任编辑 杨显硕

梁志林

装帧设计 王占梅

责任印制 闻利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规格:1/16(787mm×960mm)

印张:17.25

字数:290千字

版次: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2009年5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420-2

定价:35.00元

目 录

引言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4)
三、本书的几个主要概念	(22)
四、有关本书方法论的说明	(26)
五、本书的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29)
第一章 儒士: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34)
第一节 “依附型合作”概念的提出	(34)
一、社会交换理论评介	(34)
二、“依附型合作”概念的阐释	(37)
第二节 儒士: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42)
一、专制王权的特点	(42)
二、儒士的基本政治理念	(48)
三、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53)
第二章 西汉中期儒士与专制王权依附型合作关系的制度化	(60)
第一节 两汉之前的儒士与王权	(60)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士与王权	(60)
二、儒士与秦帝国	(64)
第二节 汉初政治特点分析	(70)
一、汉初政治社会特点	(70)
二、汉初黄老政治的再解读	(77)
第三节 儒士的努力	(82)
一、儒士的政治作为	(82)
二、儒士的理论创新	(90)

第四节 依附型合作关系的实现及其制度化	(96)
一、董仲舒的贡献	(96)
二、汉武帝的作为及依附型合作关系的制度化	(103)
第三章 汉代儒士的政治作为	(110)
第一节 两汉儒士的政治资源	(110)
一、理论资源	(110)
二、制度保障	(116)
第二节 汉代儒士的政治作为	(126)
一、以经术治国	(126)
二、教化民众、改善风俗	(133)
三、从事教育,促进儒士的再生产	(139)
第四章 儒士与汉王权在依附型合作模式下的互动	(145)
第一节 儒士对汉王权的影响及汉王权对儒士的尊用与控制	(145)
一、儒士对汉王权的维护	(145)
二、儒士对汉王权的规范	(152)
三、汉王权对儒士的尊用与控制	(158)
第二节 儒士与汉王权在依附型合作模式下的互动	(163)
一、经学——儒士与汉王权合作互动的中介	(163)
二、互动模式下的儒士	(167)
三、互动模式下的汉王权	(173)
第五章 儒士与汉王权依附型合作的效果	(180)
第一节 “汉承秦制”及两汉政治的特点	(180)
一、秦代政治的特点及“汉承秦制”	(180)
二、汉王权对儒学的认同及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化	(185)
三、汉代官僚群体的儒化	(191)
四、汉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197)
第二节 对儒士与专制王权最佳合作模式的蠡测	(201)
一、王权政治儒化的畸型——王莽改制	(201)
二、对儒士与专制王权最佳合作模式的蠡测	(208)
第六章 依附与合作的冲突:两汉儒士生存境况 及典型政治心理分析	(218)
第一节 两汉儒士的生存境况	(218)

一、紧张的君臣关系	(218)
二、艰难的仕宦生涯	(223)
第二节 两汉儒士的典型政治心理分析	(228)
一、振奋与失落,求名逐利心态及不遇心态	(228)
二、道义的坚守与忧患意识	(234)
三、退守自保心态	(240)
余论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68)

引 言

一、研究缘起

笔者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多年,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亦略有了解。中西对比,这样一些现象时时引起笔者的思考:中西思想家们肯定都曾遇到过相类似的政治困局——专制权力的非理性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极大破坏。西方思想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权力制衡”的观念,^①而西方社会正是基于这一观念逐渐演生出自己的民主制度。传统中国不然,中国思想家们始终没能找到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制衡王权。原因何在?我们同时又看到,尽管缺少制衡的权力,中国的王权政治却并没有在其一次次非理性的“颠狂”中走向灭亡,相反,它却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在中国实实在在地存活了数千年,时至今日依然“阴魂”不散。^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当然,笔者十分清楚,学界对这两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一系列的重要结论,诸如:特有的政治生活环境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生发不出现代民主思想的灵感;传统知识阶层(就其主体来说)是现实政治的参与者及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对专制王权的规范与制衡作用,但这种制衡不具有绝对性;专制王权的长期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特殊的地理环境、专制王权超强的统摄力、中国传统社会中由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所形成的超稳定结构等。但作者依然觉得这些颇具说服力的结论背后仍然存

① 西方的权力制衡思想和政治实践始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包含了权力制衡的思想。详细论述可参考周永坤著作。周永坤:《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六章“分权的实践”与第七章“分权的理论史”。

② 专制王权的一些政治观念对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依然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

有广泛的再思考空间：知识阶层当然是王权理论的论证者及现实政治的维护者及参与者，但他们是如何“参与”的？当这批有道义理想的知识人溶入冰硬的权力体系时他们的主观能力难道仅仅表现为对现实王权无奈的服从或极力地维护吗？他们能做的难道仅仅是对非理性色彩甚浓的专制王权的几声无力的道义批判吗？对于传统知识阶层的政治功能及政治角色，学界一般倾向于如下两种认识：一则，自秦汉专制帝国建立后，尤其是汉中期以后，知识阶层主体部分被体制化了，与之相随的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学术思考亦被王权完全“体制化”了，他们成了利禄之徒，学术成了御用工具。二则，先秦思想家们的“道高于君”等诸理念在中国传统知识阶层身上从未中断，其立足点在“民间”，在“社会”，在“文化”，知识阶层完全或者基本能以民间的、社会的、文化的力量与王权相抗衡。^①

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后认为，对知识阶层与专制王权的关系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更为准确的解释，这包括：专制王权的统摄力是非常强大的，故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一个足以与王权抗衡的民间的、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力量，也即中国传统社会中能规范王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王权势力范围之内；对专制王权能起到规范作用的主观力量，主要的只能来自知识阶层（商人、农民、手工业者等阶层不会形成这种力量）；传统知识阶层当然不可能形成一种对王权的绝对制衡力量，但他们也不仅仅是专制王权软弱的依附者，他们对专制王权拥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其主观的作为，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既然传统知识阶层在不得不依附于专制王权的同时又拥有对王权相当的“影响力”，我们对二者的关系就应有一个动态的观察，也即要对他们之间的互动性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作单向（这种单向或者指王权对知识阶层的规范，或者指知识阶层对王权的道义抗争）的或者表层的描述。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在阅读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理论著作时发现，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Peter M. 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恰恰能为我们动态地分析传统知识阶层与专制王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框架。我们完全可以将传统知识阶层与王权放在一个互动交换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把他们皆视为自身利益（首要的是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也即，正因为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它们之间才能达成互动的“交换”关系。我们也注意到

① 上述诸学术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或著述，研究现状部分将详细介绍。

有些学者将儒家视为专制王权的“合伙人”兼“交易者”，^①但这些学者仅仅是在儒家政治思想角度论述这一问题，没有真正深入到政治运作层面；还有，本书作者还将充分注意到交换双方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不对等性，也即知识阶层与专制王权不是一对平等的交换者。依彼德·布劳的理论，^②当交换双方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对等时，弱势一方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方能实现交换，而这种代价的最极端表现即是“服从”。显然，在王权具有高度统摄力的传统社会，专制王权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是完全可以它的交换者——知识阶层付出“服从”的代价的。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合伙人或交易者，对此，笔者定义为“依附型合作”关系，即传统知识阶层是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不称知识阶层为专制王权的政治利益交换者而称合作者，正在于本书的关注点为知识阶层在王权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也即在笔者看来，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互通有无的关系，而且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他们以自己的政治资源与对方交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实现双方共同的政治目标（此即为“合伙人”的意思，甚至还可以说得更直白些：他们之间是互为工具的^③），所以这里用“合作”一词是较为恰当的。^④

当作者的上述一系列思考完成的时候，本书的论题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 代表性学者如李宪堂。见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对于“社会交换理论”，后文将有专门章节予以介绍。

③ 李春青在《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从纯粹政治的角度看，他们（笔者注：“他们”，在李文中指“儒家知识分子”）的出仕是加盟到统治者之中，是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和利用；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们成为社会价值秩序实际上的建构者，是他们对统治者的控制和利用。”李氏的这一观点为本书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④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5年夏季通过答辩。2006夏季笔者看到了刘绪贻先生新出版的《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者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此为作者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硕士论文。该书的主要观点：自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皇帝日益依靠、重视、奖掖儒生，扩大儒生阶层，儒生则通过研习、讲述、演绎儒学，极力为皇权辩护，扩大和强化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皇室和儒生阶层逐渐从儒学中获取日益深厚的既得利益。为保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西汉起，皇室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科技工作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状态。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这就是儒学在中国统治两千余年的原因，也是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本书作者认为，刘绪贻先生将儒士阶层定位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是较为准确的。

此外,为了将相关观点论述得更加具体深入,本书将研究“区间”定位于“两汉”,原因在于,就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来说,两汉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历史时段。在我们看来,秦王朝虽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这一帝国的统治者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统治方式从而很快归于失败。正是在两汉,刘汉王权在继承秦代政治架构的基础上,与儒士合力“探索”出一套成功的王权政治运作模式,从而也就奠定了之后两千余年中国传统王权政治的基本形态。^①

二、研究现状

(一)研究现状的介绍

士人(或称古代知识阶层、知识人、知识分子、文人等)对学界来说绝非一个“陌生”的研究课题,前辈学者曾多有关注,当今学者更是从多个角度、侧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前彦时修的成果对本书作者的学术思考多有启发,而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总结亦是本书研究得以展开的起点。这里就笔者所能找到的自上世纪初以来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予以综述。由于本书的学术关注点是“儒士与两汉政治”,故而学术回顾的重点放在“秦汉士人”及“中国士人通论”两个方面。

在上述两个方面,1949年之前国内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有:陶希圣的《辩士与游侠》(商务印书馆,1931年),周振甫的《东汉党锢》(开明书店,1935年)等。论文主要有龙运钧的《士在秦汉的类型与地位》(《中央月刊》,1926年3月,第9卷第5期),叶时修的《周秦之士风》(《中华教育界》,1927年1月,第16卷第7期),丁布夫的《前汉亡国文化与士大夫之责任》(《汗血月刊》,1934年4月,第3卷第1期),陈东原的《东汉的士气》(《教育杂志》,1934年10月,第24卷第2期),李源澄的《魏武帝之政治与汉代士风之关系》(《华文月刊》,1942年4月,第1卷第3期),叶国庆的《汉儒的风度》(《教

^① 有学者这样评价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在政治制度上,秦虽建立了统一集权的中央帝国,但将这种体制加以巩固推行的是汉王朝。从社会的组织构成来看,春秋战国以来贵族政治虽然消逝,但直至秦王朝,毕竟还留有贵族政治的痕迹,只有汉王朝,君臣都起自民间,与过去的贵族政治完全划清了界限,开启了此后中国社会的新样式。在文化方面,汉王朝更是历史性地开启了独尊儒术的进程,此后太学的建立,经学的繁盛,等等,极大地塑造了后世的政治文化性格。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及知识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枢纽性的时代,它承接与整合了各种政治文化资源,为后世发展奠定了基调。”(王刚:《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2页)

育与文化》，1946年2月，第1卷第3期），王梦欧的《原士与儒》（《文化先锋》，1947年3月，第6卷第19期）等。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论著有：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9年），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相对于大陆，这一时期港台地区的学术成果较多，如劳干的《汉代知识分子的特质》（《民主评论》，1953年9月，第4卷第17期），余英时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新亚学报》，1959年8月，第4卷第1期），金发银的《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3年12月，第三十四本），许倬云的《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3年9月，第三十五本），嵇梦庵的《汉魏之际的北方高士》（《人生》，1966年3月，第30卷第11期），徐复观的《两汉知识分子的时代压力感》（《东方杂志复刊》，1969年7月，第3卷第1期），颜清史的《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仙人掌杂志》，1977年5月，第1卷第3期），李威熊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也逐渐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局面。其间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即对传统士人的关注）亦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故而有关士人尤其是秦汉士人的学术成果频出。概言之，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为：

1. 士人的个体研究，如对陆贾、贾谊、董仲舒、桓谭、王充、王符等人生平、思想、政治贡献、学术成就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甚多，此处不再详列。

2. 特定阶段、特点地域的士人及其与政治或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如先秦士人、秦代士人、汉初士人、汉武帝时期的士人、西汉末年的士人、王莽时期的士人、东汉初期的士人、东汉末年士人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有：刘泽华先生主编的《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及《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于迎春的《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马良怀的《东汉后期的忧国之士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5.2），阎步克的《王莽变法前后知识群体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研究》，1987.2），刘修明的《两汉之际社会变动中的知识分子及其命运——刘歆与新莽王朝的浮沉》（《中国史研究》，1990.4），侯外庐的《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史学史研究》，1990.4），胡宝国的《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1991.5），吴云、董志广的《两汉魏晋隐逸之风的消

长及其意味》(《北方论丛》,1991.6),王晓毅的《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颖名士》(《山东大学学报》,1992.2),马亮宽的《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社会科学》,1994.2)、《略论士人与汉初社会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01.6)、《略论汉初士人在社会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孔子研究》,2005.3),刘周堂、查屏球的《论汉武帝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2),黄宛峰的《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4),王长华的《论秦国土人与政治之关系》(《河北学刊》,1996.3),王永平的《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中国史研究》,1997.4),王继训的《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00.1)、《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齐鲁学刊》,2000.5),王保顶的《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江海学刊》,2001.1)、《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2)、《由扶汉到扶莽:西汉后期士人政治取向的转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鲁同群《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2),蓝旭的《汉末士风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3),朱顺玲的《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郑州大学学报》,2005.3),张保同的《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史学月刊》,2006.9)等。

3. 对士人的通贯性研究,也即从长的历史时段“粗线条”地或者采取“以点带面”方式对士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进行论述,如对士人的起源及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变迁的研究、士人性质及特点的总体评价、士人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等。代表性论著有:葛承雍的《儒生·儒臣·儒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尤西林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修明的《儒生与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阎步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质》(《文史知识》,1988.3),赵东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的背景与契机》(《浙江学刊》,1992.5),刘德增、王大建的《从侏儒说到儒——儒为术说证实》(《山东大学学报》,1996.4),李鲁祥的《士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价值分野》(《齐鲁学刊》,2002.5),干春松的《儒生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党大恩、党艺峰的《“史记”学术史传研究——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状况》(《人文杂志》,2003.3),林甘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3),田刚的《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

4. 对士人的分类研究(包括对特殊类型的士的研究),如对隐士、方士、

太学生、党锢人士的研究等。代表性论著：韩兆琦的《中国古代隐士》（商务印书馆，1996年），冷成金的《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黄宛峰的《论东汉的隐士》（《南都学坛》，1989.3），《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人文杂志》，2000.1），冯辉的《略谈中国古代社会的隐士》（《求是学刊》，1989.3），王克奇的《东汉逸民论略》（《齐鲁学刊》，1992.5），高敏的《我国古代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94.2）等。

5. 对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士人与经学、士人与教育、士人与文学等。代表性论著：马彪的《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4），刘厚琴的《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齐鲁学刊》，1995.3），华友根的《略论两汉的学校与教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1），杨天宇的《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3），刘太祥的《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4），安作璋、刘德增的《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史学月刊》，2000.1），唐子奕的《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0.3），徐华的《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史学月刊》，2001.2），李元的《论经学与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北方论丛》，2003.6），曾祥旭的《士与西汉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

6. 对士人与中国政治的研究，这主要包括士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角色、政治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论著：阎步克的《士大夫与官僚制》（载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9页），《儒·师·教——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政统”“道统”的关系》（《战略与管理》，1994.2），《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明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苏诚鑑的《“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西汉亡于儒生论》（《安徽师大学报》，1988.4），葛志毅的《汉代博士与朝议制度》（《北方论丛》，1993.5），《汉代博士奉使制度》（《历史教学》，1996.10），张兆凯的《汉武帝与儒学关系新论》（《求索》，1996.3），王健的《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中国史研究》，1996.3），李伯齐的《博士论议与两汉政治》（《管子学刊》，1997.1），田兆元、王恩重的《论两汉儒家神学与皇权的离合关系》（《上海大学学报》，1998.2），高兵的《东汉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齐鲁学刊》，1998.5），卜宪群群的《汉代的文吏与儒生》（《秦汉史论丛（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宝村的《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人文杂志》，2000.2），于迎春的《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

(《晋阳学刊》,2001.1),李军的《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浙江大学学报》,2001.3),赵沛的《养士之风与汉初的豪族政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张荣明的《汉代儒术与政治信仰》(《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5),丁启阵的《汉朝统治者与文人儒士关系的发展过程》(《文史知识》2003.11),葛荃的《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刘绪贻的《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

7. 对士人的心态、心理、人格、价值取向的研究。代表作如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毅的《潇洒与敬畏——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岳麓书社,1995年),张仲谋的《兼济与独善——古代士大夫处世心理剖析》(东方出版社,1998年),杨树增、陈桐生、王传飞的《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方铭的《期待与堕落——秦汉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刘修明、卞湘川的《历史的视角: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客观属性的矛盾》(《江汉论坛》,1990.1),韩玉德的《秦汉主流派士人人生价值观简论》(《齐鲁学刊》,1992.2),马彪的《东汉士风中的“禄利”、“名节”之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2),刘汉东的《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心态探析》(《学术研究》,1992.4),刘修明的《汉末至魏晋文人的心态与人生择向》(《学术月刊》,1993.5),王晓毅的《汉魏之际士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史学月刊》,1994.6),孔毅的《汉晋名士价值观念的演变》(《齐鲁学刊》,1995.2),张涛的《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山东大学学报》,1996.2),严云受的《孔子的入世精神与中国文人的忧患心态》(《安徽大学学报》,1997.4),徐国荣的《汉魏名士的人格萎缩和通脱之风》(《学术月刊》,1997.8),臧知非的《“义不讪上,智不危身”发微: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儒生的人格蜕变》(《苏州大学学报》,2000.4)、《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史学集刊》,2003.2),张峰屹的《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南开学报》,2001.2),蒋方、张忠智《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析》(《湖北大学学报》,2001.2),陈兰村、葛永海的《文化人格的压抑与自救——论古代文人的自嘲意识》(《贵州社会科学》,2001.2),李文洁的《走向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从汉代的三篇不遇赋谈起》(《求是学刊》,2002.3),庞天佑的《论东汉汉后期士人的群体心理》(《史学月刊》,2002.5),严国荣的《屈原情结的汉代嬗变》(《唐都学刊》,2003.4),陶贤都的《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唐都学刊》,2003.4),蒋方、张忠智的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湖北大学学报》,2003.5),黄宛峰的《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中州学刊》,2003.6)等。

8. 对通过士人所表达及实践的儒家政治理念、理论、思想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葛荃先生的《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的政治心态》(《史学集刊》,1992.3)、《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华侨大学学报》,2001.2)、《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泽华、葛荃的《论儒家文化的“人”》(《社会科学战线》,1988.1),张立伟的《隐逸四要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3),陈桐生的《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说与儒学独尊》(《齐鲁学刊》,1997.1),孙家洲、邬文玲的《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中州学刊》,1997.4),成其圣的《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的王霸之争》(《河南大学学报》,1998.1),郝虹的《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孔子研究》,2000.3),刘韶军的《试论儒士的政治理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4),胡秋银的《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安徽大学学报》,2002.1)、《汉魏士人隐逸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5),郑训佐的《略论儒道两家的隐逸观》(《山东大学学报》,2003.2),张秋升的《西汉儒家历史观述论》(《齐鲁学刊》,2003.4),李春青《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社会科学辑刊》,2004.3)等。

当然,笔者这里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分类标准都是相对的,许多论著可同时归入多类,但这种粗略的划分基本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国内(大陆部分)学术界在士人尤其是两汉士人方面的研究状况。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相关的博士、硕士论文,其中与本文论题关系最为密切且尚未出版者有南京大学王保顶的博士论文《汉代士人与政治》(2000年)、山东大学王继训的博士论文《士与两汉政治》(2000年)、华东师范大学王刚的博士论文《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2004年)、浙江大学余全介的博士论文《秦汉政治与儒生——两百年政治风云与儒学独尊》(2005年)等。^①

这一时期港台及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余英时的《中

① 王保顶博士论文的关注点为士人在汉代“儒士化”进而“士大夫化”的过程;王继训的博士论文重点论述的则是不同类别的士(如儒士、文学之士、方士)与政治的关系;王刚的博士论文旨在考述儒家学说与汉代政制相互影响的演化过程,兼及儒士与专制王权的关系;余全介所学专业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主要关注的是“儒说由遭打击的低谷到受独尊的颠峰这一历史过程”(作者语)。本书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皆迥异于这几篇博士论文。

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徐复观等所著《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张蓓蓓的《东汉士风及其转变》(台湾大学文学院,1985年),西川利文的《汉代博士弟子制度的开展》(《鹰陵史学》一七,1991年)、《汉代的博士弟子制度》(《鹰陵史学》一六,1990年),颜崑阳的《论汉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灵模式》(台湾政治大学《汉代文学与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青木哲郎的《贾谊的太子教育论和西汉儒学》(《中国一社会与文化》六,1991年),远藤祐子的《前汉前半期儒家的政术与地方社会》(《立命馆史学》十二,1991年),边土名朝邦的《桓谭的政治思想》(《国际文化论集》,西南学院大学,六一一,1991年),余英时等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陈启云的《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杜维明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谷川道雄的《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与士大夫的问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10月),许倬云的《秦汉知识分子》(见《释中国》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韩复智的《东汉大思想家王符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五期)、福井重雅的《班固与董仲舒》(《中国一社会与文化》十六,2001年)等。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作者的能力所限,港台地区及海外学者的相关成果未能尽窥其貌,但作者相信凭藉自己努力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及通过其他学者对相关学术信息的转述(及对海外著名的学者的当面请教^①)基本能了解港台及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大貌。

(二)对学界代表性论著的评述

本书的旨趣在于从一个新的角度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探讨士与两汉政治的关系。下面笔者拟就对这一论题作出相当深入研究的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及学术观点予以述评。我们认为,这些论著足以代表当今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成就。至于其他一些具有创新意义或颇能自持其说的学者的论著,笔者将会在本书的行文过程中予以充分关注。^②

^① 笔者曾就本课题美国学者的研究现状请教过时在南开大学讲学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启云先生。

^② 代表者如林存光先生的《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林著的关注点不在儒士,而是旨在阐述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视角新颖,观点独到。林著的一些极具创新性的观点或提法对笔者思考儒士与汉王权的关系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刘泽华先生主编的《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是国内较早对两汉士人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该书由孙立群、马亮宽、刘泽华共同执笔,旨在论述士人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存样态(着重讲士人与社会的关系)。书中的主要观点为:士的生存状态(与先秦相比)在秦汉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丧失,这与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建立及政治对文化的垄断密切相关。但作者同时敏锐地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士人既是推动者又是被动者。概言之,在这一时期,士人由战国时期的自由(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经由汉初数十年的准自由期——逐渐过渡到“士大夫”的生存状态。^① 作者在书中指出,秦汉之后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而这一学说真正在政治运作中得以实现,作为知识载体的士人作用非常。为此,书中列专章分析了儒生在儒术政治化及儒家观念社会化中的作用。关于士人的生存境遇,作者指出,权与道在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始终是一对矛盾体,甚至在政治实现对文化高压控制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因为毕竟知识学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书中对士大夫状态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在权与道之间的选择作了论述,这主要指士人在政治高压下的不同人生选择及学术发展的不同进路。其中,作者对那批选择“逃避”政治的士人——隐士群体多所关注。对隐士的生活环境、分类及其存在的社会政治价值,书中有专章论述。此外,社会的儒学化及官吏的士大夫化必然带来整个社会风貌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书中对士在汉代社会结构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变化后士在社会中的位置及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群体在社会中的作为)做了详细论述。笔者对该书的观点基本认同,但亦感觉好些论题有进一步深入剖析的必要,这亦正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葛荃先生是“近年来于知识分子研究用功尤勤”的又一位学者,他在士人方面的代表作有《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等专著及一系列文章。其中《立命与忠诚》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该书史料详实、角度独到、观点新颖。作者没有对士人精神泛泛而谈,而是抓住一个典型(明代东林党这一士人群体),以

^① 作者指出,士人的这种演变是经由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和仕途的利诱及王权对诸侯、权贵养士的打压来实现向政治的归依的,与此同时,士人也逐渐丧失了思想的独立性。由此,大批士人走向臣仆化,并逐渐形成一种经学化的被动思维方式。